

中国传播史论

郝朴宁 陈 路 著
李丽芳 罗 文

中国传播史论

郝朴宁 陈路文 著
李丽芳 罗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播史论/郝朴宁等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ISBN 7 - 81112 - 031 - 3

I. 中... II. 郝... III. 传播—文化史—中国
IV. C206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1885 号

中国传播史论

郝朴宁 陈 路 著
李丽芳 罗 文

责任编辑: 冯 峨 蔡红华

装帧设计: 丁群亚

责任校对: 段建堂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490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1112 - 031 - 3/G · 436

定 价: 49.00 元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 18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目 录

第1章 先秦时期	(1)
第一节 中国文化原传介质	(1)
一、原始信息储存手段	(2)
二、原始传播信息分析	(4)
三、原始传播介质分析	(9)
第二节 符号的文化与传播	(17)
一、关于“符号”的解释	(17)
二、文字与思维的一般关系	(18)
三、语言空间和思维空间的建立	(26)
四、古典诗歌双重空间的心理生成机制	(35)
五、语言符号自身的创造功能	(40)
第三节 先秦多元传播思想	(46)
一、原始舆论意识	(47)
二、说服理论的崛起	(56)
三、先秦信息意识	(64)
四、先秦传播理念	(67)
五、教育传承理念	(71)
第2章 秦汉时期	(89)
第一节 权力统一后传播手段与传播实践的互动	(89)
一、交通与传播	(89)
二、舆论与控制	(91)
三、信息的传播与储存	(92)
四、最早的信息传播机构	(96)
第二节 传播与反传播观念分析	(97)
一、朝议与清议	(97)
二、传播与反传播	(101)

2 中国传播史论

第3章 唐宋时期	(110)
第一节 文化整合与传播手段多元化	(110)
一、盛世新气象	(110)
二、传播网络的形成	(112)
三、露布、檄文与条报	(117)
四、进奏院	(123)
五、古老传播手段的延存	(127)
第二节 民本主义传播思想的发展	(132)
一、纳谏与兼听	(132)
二、民本主义传播观念	(134)
三、唐代古文运动提出的传播观点	(136)
四、宋代新闻检查制度	(140)
五、宋代民间传播——小报	(142)
六、宋代官方传播——邸报	(145)
七、欧阳修的“面事”观	(146)
第4章 元明清时期	(149)
第一节 权力媒介与非权力媒介的平行发展	(149)
一、元代邸报之争	(149)
二、明清的官报与民报	(150)
三、塘报	(162)
第二节 话语禁锢与话语对抗	(166)
一、明清广告理念	(166)
二、东林“清言”	(167)
三、基本新闻观的确立	(168)
第5章 近代	(177)
第一节 文化侵略与新传播手段的进入	(177)
一、帝国主义经济与文化的双重侵略	(177)
二、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	(179)
三、晚清官报	(182)
四、海外华文报	(184)
五、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报刊	(187)
六、复辟皇权与报业凋零	(192)

第二节 社会激变中的传播理念新内涵	(193)
一、康有为的传播理念	(194)
二、梁启超的传播理念	(196)
三、谭嗣同的传播理念	(199)
四、严复的传播理念	(202)
五、章太炎的传播理念	(203)
六、孙中山的传播理念	(204)
第6章 现 代(上)	(208)
第一节 无线电广播的进入与发展	(208)
一、广播的进入与发展	(208)
二、广告业的发展	(211)
三、电影的进入与发展	(212)
第二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报刊发展	(222)
一、《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222)
二、“五四”时期新闻事业的变革	(228)
第三节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	(230)
一、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产生	(230)
二、大报与私营报业的发展	(237)
第四节 新闻理论的起步	(239)
一、徐宝璜与《新闻学》	(239)
二、邵飘萍与《实际应用新闻学》	(242)
三、戈公振与《中国报学史》	(245)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新闻观念的初步形成	(247)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观	(247)
二、新闻舆论分析	(252)
第7章 现 代(中)	(261)
第一节 国民党新闻统治的构成与分析	(261)
一、独裁统治与独裁新闻	(261)
二、话语对抗	(266)
第二节 日本新闻与对华侵略	(269)
一、媒介——耳目	(269)
二、战争机器的喉舌	(276)
第三节 海外赤子新闻报国	(279)

4 中国传播史论

第四节 抗战硝烟中的“外记”	(284)
一、正义之声的援助	(284)
二、史沫特莱与斯诺	(288)
三、贝特兰	(294)
四、走近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记者	(297)
第五节 国统区各色新闻的发展	(301)
一、红色新闻	(301)
二、走向红色的新闻	(304)
三、范长江	(306)
四、坚持民族本色的新闻	(307)
第六节 红色新闻的发展	(308)
一、红军时代的新闻	(308)
二、抗战时期的共产党新闻	(313)
第七节 对立的新闻观念	(318)
一、孙义慈与《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	(320)
二、《新中国新闻论》	(321)
三、管翼贤与《新闻学集成》	(323)
四、张友渔与《新闻之理论与现象》	(325)
五、邹韬奋的新闻观	(329)
六、范长江的新闻观	(331)
七、张闻天的新闻思想	(333)
八、博古的新闻思想	(336)
九、延安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的改革与我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 发展	(338)
第8章 现代(下)	(349)
第一节 国民党新闻事业的衰落	(349)
一、发展·统制·衰落	(349)
二、国民党新闻观念分析	(354)
第二节 民营新闻媒介的发展	(358)
一、民营媒介与新闻自由	(358)
二、萨空了的新闻理念	(362)
三、新闻评论理念的发展——从郭步陶到程仲文	(369)

第三节 冷战下的舆论较量	(374)
一、冷战舆论对中国时局的影响	(374)
二、走进解放区的外国记者	(378)
三、利益决定态度	(380)
第四节 走向胜利的新闻	(384)
一、困境与蓄势	(384)
二、新闻事业的形势转换	(387)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新闻文化观	(390)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观	(390)
二、列宁的新闻观	(395)
第六节 革命新闻观念的内涵	(399)
一、毛泽东的新闻思想	(399)
二、刘少奇的新闻思想	(407)
三、陆定一的新闻思想	(410)
四、胡乔木的新闻思想	(412)
五、恽逸群的新闻思想	(416)
六、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	(419)
七、结 语	(425)

第 1 章 先秦时期

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是同传播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而文化价值的实现往往也是通过媒介来完成的。人类的传播手段与技术不断发展，并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强大起来，这就使得媒介与文化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同时，传播作为一种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是瞬间完成与实现的，这又使传播活动本身获得了历史的延续性，而其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对于历史的认识活动，融入到了文化的长河中。

第一节 中国文化原传介质

人类文明到底应该从哪一时刻算起？人类的传播活动究竟应该从哪一时刻算起？这已经无法作出明确的回答了。但是，人类文明同人类的传播起步于同一时刻，这也许不会有异议。因为，自人类开始文明发展的那一时刻起，就开始了思想交流、感情交流、信息交流，就开始建立人际关系，也就开始有了最初的传播活动。传播技术也是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传播需要有一定的媒介，因为媒介往往决定了传播的形式。

传播媒介是实现信息传递的中介，是指各种运载复制并传递信息的物理形式。这种物理形式，包括了物质实体和物理能。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可以从多角度认识与把握的，就其文化与文明的发展看，它既是人类使用传播媒介的历史，也是媒介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因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递进过程，是后人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不断产生新的认识，进行新的积累的过程。这就要求前人必须以某种方式将其已有的成果传递给后人。在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信息是不会自己流动的，总是需要借助于一定的“中介”去实现信息的“流动”，所以，媒介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失去了一定的载体与中介,人类的信息传递就无法实现,甚至连最起码的思想沟通也是不可能的。而人类的文化得以产生、延续与发展,正是在对于传播媒介的开发、使用与控制过程中实现的。这无疑为我们确立起了一个新的认识与掌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

人类信息传播媒介的产生与发展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它一方面是人类社会发 展程度的标志,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发展进步,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人类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增强了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改变着人类已有的时空观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不断发明和发展传播媒介的历史。从传播学的角度,我们也对“人”作出新的认识,人类超越其他生命之处,并不在于自然传递信息的感官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其独有的创造、使用传播媒介的能力为其他生命形式所没有。

一、原始信息储存手段

在这里,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人类最早是怎样进行信息“处理”的。因为,传播是手段,信息才是目的,而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信息的储存与处理,但早期人类在方式上就“原始”得多了,这是由其“原始”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对于个体的人来说,记忆是储存信息资料的具体表现。早期人类的思维活动,除获取身边产生的信息资料外,主要依赖于过去的储存。其信息储存的方式又可分为头脑记事和体外记事两种。根据现代研究提供的资料来看,他们的记忆力达到了一种让人吃惊的程度。澳大利亚昆士兰的土著人,一首歌唱了整整5夜,而在90英里外的另一土著部落的人,虽不懂其语言,也不解其意,却能准确无误地唱出同一首歌。大脑是人天生的记忆工具和信息储存器。但人的记忆是由人的具体存在所决定的。为了使个体的记忆为群体所有,永不消失,使信息产生共享意义,早期人类开始在体外寻找记忆工具和储存器,并创造出了各种体外记事的方法。在这些具体的方法中,完全没有抽象概念的地位,只有一定物象的联系与转换。

实物记事,以一些有形的实物记录某一具体的事件与传说。这些具体实物的思维功能,是其形象能够指称一定的对象,并转换成一定的意象存入人的大脑。人类学家林惠祥曾经在其《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引用了这样一条材料:“萨科人(Sacs)和福克斯人(Faxes)有一种神物称为‘弥

甘’ (micams)。它是一个箱子，内藏各种奇异的物件，每一种都表示部落的一项史实或仪式。在宗教节日时，老僧一件一件取出给大家看，并说：‘这些物件是要我们记住威疏卡 (Wisuka) 在世时教给我们应做的事’。”当然，这些物件本身是无意义的，它们只有以其形状、形象在人脑中同一定的意义联系后，并转换成一定的意象，才能使人明白和理解其中的“信息”意义。

结绳记事，即以绳子打结的方式记录某种事物、事实、事件或活动。绳结的思维功能为，它本身是一种实物性符号，其原有价值在记事过程中完全消失，只有以其大小、颜色、形状上的差别，对应有关事物的性质、内容、数量及重要程度。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有关于结绳记事的记载。《易传·系辞下》上有“上古结绳而治”。《周易正义》引郑玄曰：“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作为一种记事符号，结绳记事比一般实物记事法抽象与规范，同具体事物之间无必然联系。所记信息也必须联系具体情景才能明白，并且只有结绳者才能破译。

刻木记事，即在木板上刻上某种印记，以记录事实事件。据《隋书·突厥传》和《旧唐书·西南夷传》记载，当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无文字，“刻木为契”这种记事方式一直到了20世纪40年代，还能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看到。北美印第安人安尔贡金 (Algonkin) 部落就是用刻木记载他们的神话和历史的。刻木记事晚于结绳记事，但所记内容比较具体，其绘纹已经接近图画符号了。

图画记事，即通过图画或图画符号记录事物事件。从思维发展的角度看，图画比结绳和刻木更形象具体，所以，更容易实现信息的存储与转换。记事图画是从一般图画中分离出来的。这种分离一旦完成，它就脱离了艺术与宗教的范畴，而成了一种特殊的存储信息的手段了。同艺术和绘画不同，记事图画的线条向着简单化的方向发展，并逐渐符号化。但它又不同于后来的象形文字，它仅仅是提供一种整体性信息，但它又和象形文字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资料看，图画记事曾经是人类保存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

从语言的产生到文字的发明，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在文字产生以前，人类是通过口头传播交流信息的。这一时期的主要媒介或者说唯一的媒介就是语言。实际上，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唯一可独立使用的传播工具 (媒介)，即使最现代的传播媒介，也仍然要借助于语言，并以语言为基础，或者说，它们都不具有独立性。文字虽然是独立自主的体系，

4 中国传播史论

但它却是语言的代表,是符号的符号,正如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说,语言是商品,文字是货币,文字不依附于语言也就一文不值了。

语言的产生也就意味着人类口头传播阶段的开始,就其发展递进而言,并不意味着文字的发明,就是这一阶段的结束,因为口头传播阶段几乎涵盖着整个人类传播的历程。换句话说,口语传播的历史贯穿于人类传播历史的全过程。

二、原始传播信息分析

口头传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今天无法确切地知道,但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播方式,今天仍在一些地区,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留着。如果能够对此进行考察,也许能够得到某种近于原始意义的解释。

在少数民族地区至今流传着许多歌谣,通过这些歌谣,可以了解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有相当数量的歌谣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完全靠口传继承;另一方面,大部分少数民族教育普及率极低,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来说,也只能靠口传继承历史的经验与祖训。从大的方面看,这些保存下来的歌谣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类型:

首先是同战争有关的歌谣。在原始社会,各部落之间由于要扩大自己的狩猎范围、掠夺食物而发生战争,这种战争关系到部落的生存,关系到每一个部落成员的切身利益,所以,男人们都勇敢地走上了战场,为生存去拼杀。为了鼓舞自己的士气,人们便根据战争的动作、节奏和情景,创作出了有关战争的歌谣。在这些歌谣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当时人们的思想、意志、情绪,了解到当时的社会状况。

其次是同性爱有关的歌谣。人类自其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两项重大任务,一是社会物质的再生产,二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关于后者,也产生出了许多歌谣。早期人类的两性关系是极不稳定的,还停留在性感阶段。而当时的人们又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只能神秘地看待人类如何繁衍、异性何以相配、生命从何而来等问题。随着人类自身文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对偶婚、一夫一妻制,这意味着人类从性感阶段进入到了性爱阶段。性爱是人类的本能,同时也是人类一种崇高的感情。男女青年寻求爱情时,就产生出了歌颂这种崇高感情的歌谣。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里,对唱情歌,至今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活动。

再次是同原始宗教有关的歌谣。原始宗教,是早期人类的宇宙观,在这种宇宙观的影响下,人类出于各种宗教活动的需要,产生了许多宗教意

味极浓的歌谣。纳西族东巴文化中的口诵经就多为宗教诗歌；彝族原始宗教的经典中不但有五言古歌谣，甚至有长达千行的史诗。布朗族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仍保留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生产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祭祀活动，祭祀时都要唱歌。在科学文明没有建立之前，人类的生产与宗教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那时人们认为人与自然都是由神灵主宰的，所以，生产时要祭祀，唱祭神的歌，求神灵保佑五谷丰登；祭祀时也要唱有关生产的“神曲”，祈求神灵保佑人畜兴旺。

最后是同风俗有关的歌谣。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在历史发展中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产生出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所以，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而口传歌谣往往是同风俗联系在一起的。如各民族有各自不同的婚俗，就产生出了相应的歌谣。彝族支系阿细人和撒尼人有逃婚的风俗，于是就有了独特的《逃婚调》。各民族的丧葬习俗也是不同的，这又产生出了各种不同的、极具民族特色的丧歌。如彝族的《送魂经》不仅反映了其信仰，而且描述了按一定路线，将死者的灵魂送到祖先的发祥地的过程。经中所说的路线与民族发祥地，同该民族的迁徙路线有关。这种丧歌往往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同时又包含了该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及其该民族的历史。

了解早期人类生活的另一重要信息来源是传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也是以口传的形式保存下来的。传说不同于神话，神话是想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幻想）的产物，而传说则有较强的当时性和历史性，它反映的是人，具有更强的历史信息价值。从发展过程看，传说晚于神话，传说产生的年代，人们的生产力有所提高，社会生活开始复杂化。作为思想意识，已经发展到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和反映客观现实生活，传说也就比神话能够更现实、更准确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劳动生产。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传说往往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地方风物，是以特定的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当然，其中也有幻想的成分。我国少数民族大多没有自己的文字，其历史靠口头传承一代代地流传下来，这在一定意义上就形成了口头传说，也就是口头历史。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重视对于这些古代“化石”进行研究，就在于通过它，可以了解过去的历史，这些口头传说，传递着历史的信息。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比较迟缓，口头传说中原始社会的印记也就更深，反映着原始社会

的意识形态。如景颇族传说过去是男子出嫁，后因男子出嫁时带的东西多，而又总是忘这忘那，有一女子就自己带了东西到男子家去，从此，男嫁改为了女嫁。这一传说反映了母系社会的解体，男子在生产劳动中逐渐占了主要地位，财产增多，成为了社会的中心，开始进入父权社会的历史。

历史学家早就实证了人类在野蛮时代，因食品极度的缺乏，曾流传过食人的习俗，这在有些民族的口头传说中就有所反映：古时候，盖房子杀父亲，盖仓库杀母亲。后有人见牛生仔很痛苦，就对母亲说起此事。母亲告诉他，她也是在痛苦中生下他的，这人觉得吃自己的母亲太不对了，于是在帮助别人盖房子时，就将分得的人肉腌起来，而自己盖仓库时，就将母亲藏起来，拿出原来腌好的人肉。从此，后辈们盖房子、建仓库时，就不再杀父母，而是改为杀牛羊来吃了。这些传说对于研究古人类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信息价值。

认识与把握历史信息，在重“物”重“事”的同时，还应该重视有关的经验信息，这方面，谚语为我们提供了丰富且极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我们现在仍以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为线索，来看一下谚语中的信息含量。云南少数民族因其历史原因，保留了许多原始生活的遗迹，崇山峻岭与茂密的原始森林，切断了他们同外界的联系，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封闭或半封闭的社会，并培养起了他们警觉的心理屏障。艰难的生存环境、难以依托的文化背景，使他们将世代代积累起来的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全部知识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递下来。谚语在他们的生活中是被作为具有最高意义的“祖理”来看待的，是具有“历史经验”的意义的。如“阿公的鬼要祭，阿祖的规矩不能丢”，谚语被作为讲述寨规族理最精粹的语言形式，记载历史的艰难、历史的教训、历史的传统，并以历史经验的权威性来强化个体对于群体的顺从，使民族生活的传统秩序得以维持。如佤族的谚语中有：“十辈不分祖，五代不分氏。”据搜集者的注释：朴绕佤族以五代为一大氏，相互间不能通婚，并有抵债、复仇的权利，而西盟一带的佤族则十代不分祖，其间不能通婚，有抵债、复仇的权利。这是一种传统对于人的制约，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服从于它，并受到全社会的共同监督，是一种无形的法律。摩梭人有谚语说：“肉撞着肉不痛，肉撞着骨头痛”，这是对其母权制家庭的解释。自家的女儿相互间有意见不要紧，如果将女儿嫁出去，或将别家的姑娘娶进门，就容易产生纠纷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秩序，它被认为是天经

地义，不可违反的，而谚语就起着训诫和社会监督的作用。

早期人类社会出于生存的需要，特别强调生活的群体性。对于违反群体行为规范者，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将其从群体中驱逐出去，这对于生产力极低的人们来说，被驱逐者无疑是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轻霜冻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纳西族谚语），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强调。这种由生存需要形成的聚居形式，经血缘关系和传统文化精神的“提炼”，又形成了共同的群体意识的有着严格制约意义的生活模式。强调个体对于群体的服从，两者荣辱与共。根据历史的规律，封闭状态下的社会发展缓慢，而个体对于群体的依赖性也就相对增强。反映这类情况的谚语通常以种族的生存和繁衍的强烈愿望作为动力，转化成为社会成员的普通品质。如傣族谚语“小麻雀战胜大象是因有朋友相助”，彝族谚语“竹筏怕散架，兄弟怕分家”，提醒着人们的群体意识，要求个体的行为定向同群体的行为定向相一致，以维护生活的正常秩序。

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总是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实现的。在早期人类社会中，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歌谣、谚语外，图腾也是文化表现的重要媒介，它包含着原始先民们的各种观念意识，自然也就成了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关注的对象。我国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环境封闭，社会发展缓慢，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原始社会的痕迹，如图腾崇拜。图腾崇拜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动物和植物，因为在早期人类社会，人同自然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如彝族将虎作为图腾对象，认为虎骨能撑天，两眼为日月，牙齿化成星星，肠子变成江河，虎皮作地皮，虎毛成草木。有些民族把葫芦和瓠瓜类等植物作为图腾对象，是因为它们不仅有食用的自然属性，这种属性演变，就使其成了化成天地万物的“抽象”与生育人种的始祖。

人类认识的发展，不是从审视自己开始的，而是在审视环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自己的认识。人类的图腾活动主要产生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狩猎和采集时代。自然界同人类关系最密切的是各种动物与植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由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先民全部经验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同这些动植物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的低下，生产技术的落后，使他们处处感受到自身的软弱，真诚地希望能够像虎一样的凶猛，像狗一样的灵巧，像鸟一样的飞翔，像鱼、青蛙一样地繁衍后代。而这些图腾对象所具有的某种能力，对于那些先民们来说又是那样神秘。这种神

秘性,使先民们在寄托自己情感的同时,也将它们“神话”放到了特有的位置上去。

现代传播学的研究,往往不遗余力地强调着电子媒介的优势,但是,真正人类信息传播的最重要的媒介仍然是语言,离开了语言,也就无所谓信息传播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语言成为了人类思想的象征符号和运载信息、传递文化的重要工具,而在原始先民的观念中,语言还具有现代人所无法想像的意义,作为愿望的寄托,甚至作为一种信仰,它是支配自然的“上帝”。语言的这一意义与功能,首先表现在了原始先民对待名字的观念上。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名字只是个体的标识符号,并不将它看得过于重要。但在原始先民那里,名字却是一种必需,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名字关系到一个人的性命,所以,孩子出生后,立即由巫师占卜定名。否则,认为孩子就要受到鬼的支配。名字体现着人的愿望,孩子亲人的愿望可以因名字而得以实现。名字甚至可以成为生者对于死者的补偿,有的他们将死者的名字重新用在孩子的身上,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死者的灵魂再生。他们还认为名字是不变的,重新命名可以克服疾病与厄运,东晋葛洪在《神仙传·老子》中说:“人生各有厄运,到其时,若易名字,以随元气之变,则可以延年度厄。”这是用道教的理论对这一观念进行的解释。成中英先生在《论中西哲学精神》中说:“一个人与一个物的存在,都是不同性质的组合,因而可以‘约化’为不同性质的组合;一个人的名只代表该人的特性,以及这个人的指涉。这样,所有的具体事物都变成了可名的性质;而对具体事物取名,则代表了对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的肯定和认知;‘名’亦即具体事物的特殊化、突出化的表示,它具有存在论和认识论的意义;‘名’是一组性质,以及对某个特殊个体的认定,这个个体实质上是项,它被名为专有名词,只是表示它是唯一的存在。”

咒语是人类语言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特别是在原始先民那里,咒语被认为是可以支配自然、控制自然的。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认为:“在巫术中,人的单纯意志就是支配自然的上帝。”“凡是宗教借着上帝、和上帝同做的事,巫术是单凭自己独立地做。”这种“单纯意志”作为信息,其载体就是语言——咒语。在巫术同宗教观念融合之前,这种咒语就是原始先民的“上帝”。“在名字上寄托愿望和期冀,是以特定的个人为对象,通过他一生的行动来实现。咒语则不同,它是直接以自然为对象,凭

借语言去直接实现愿望”。但“当巫术演变为原始宗教之后，咒语也产生变化，其主要标志是咒语也含有祈求神灵、依赖神灵的成分。”^①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早期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原始分配制度使人生活在平等关系之中，共同的敌人是神秘的大自然，共同的欲望是获得足够的食物。在这种情况下，咒语的对象是自然。但当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争斗产生之后，咒语的内容也随之发生改变，由自然转向了人类社会，出现了恶意的诅咒。由于原始先民非常重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神与神之间关系的变化，诅咒也从人类社会延伸到了神灵之间，并构成了早期人类的一个特殊的精神世界。

三、原始传播介质分析

信息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媒介才能够进行传播，关于媒介，现代传播学研究更多地注意到了语言文字、印刷、新闻、广播、电视、网络等。但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看，信息传播的媒介远远不止这些。特别是我们的祖先同其他民族相比，具有更强的信息传播意识（也许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实现的），创造出了一些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媒介。

我们这里首先要介绍的是青铜器与金文。人类在漫长的生产劳动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很早就学会了铸造青铜器。在我国，铜器制造始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铜石并用时代，距今约6000年前就已经有红铜器出现。红铜的延展性好，易于锻制各种小工具和装饰品，但硬度差，锻造成的工具不耐用。后来，人们又学会了将红铜与锡或铅按适当的比例熔铸在一起。这样，既提高了硬度，又加强了其韧性，铸造出来的工具（包括兵器）锋利且耐用。这种铜合金，就是所谓的“青铜”。距今约5000年前的甘肃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刀，是我国日前公认的最古老的青铜器。

商周时代，青铜器制造在各类手工业中居于首位，为王室和贵族所垄断，并专设工官以监督青铜器的生产。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有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出土。除工具和兵器外，多为青铜礼器。礼器是用来体现“礼治”的。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青铜器皿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即所谓的“藏礼与器”。这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有重要的作用。例如鼎，是饮器，

^① 杨知勇：《巫术与诗歌》，见《云南民间文艺源流新探》。